

那十年——赫鲁晓夫沉浮纪实

〔苏〕阿朱别依 著
安文 增继 译

那十年——赫鲁晓夫沉浮纪实

〔苏〕阿朱别依 著

安文 增继 译

书海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三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5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ISBN 7—80550—049—5

G·30 定价：2.60元

1966年的元旦，我和妻子是在好友家中度过的。他们家的窗户朝向伏龙芝滨河街。冰雪覆盖着的河流和高尔基文化公园的林荫路尽收眼底。公园里滑冰的人们影影绰绰，不断掠过。五颜六色的彩灯、闪亮发光的“魔圈”……这绚丽多彩的色调和光泽描绘出不象城里那样明亮的涅斯库契公园的轮廓。这里的光明和黑暗，就象关于善与恶的童话，与我们等待钟敲12响的心情完全相符。

黑乎乎的军用列车在横跨河流的环形钢铁大桥上沉重地呼啸着，隆隆驶过。我对在节日里工作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同情心。报界的人在节日值班也是常有的事。那天晚上《消息报》的同行们将版面拿给另一位编辑去签字。现在我在节日期间的夜晚是空闲的。

几乎临近清晨，又到了几位姗姗来迟的客人——著名演员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位头衔很高的军人。女士们数了他肩章上的星星，在男士们的帮助下才弄清他是上将。

“我和将军是刚刚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招待会上认识的，不过这已经是去年了。请诸位多关照。”演员介绍了将军的名字和父称，大概他对将军的情况了解得也只有这么多。

应当说将军是个不错的人，已同他说好要“玩个通宵”的。看起来他并不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家里而感到拘谨。新年里所有的人都仿佛善良而聪颖，并且都好象朋友一样。这位客人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家的主人——喜欢他那高大的身躯，深沉的男低音，以及他的和善和机敏，他使大家在餐桌旁很愉快，使已显疲劳的伙伴精神振奋，情绪高涨，就象一位有经验的看守篝火的人一样，一直关照着炭火温度不减…

...

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夜晚一晃而过，即使有过一些重要的谈话，也不过是表达一下在生活环境的重压下沉没的、无法实现的愿望，在这些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谈话中，又耗费了多少言辞！可我们一直谈呀、谈呀，就象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样欲罢不能，虽然心里都明白，滔滔不绝的谈话跟尼亚加拉瀑布^①完全是两码事。

要不是那位将军，那个新年的“谈话夜晚”大概就从记忆里消失了。我没发觉从何时起他与主人的谈话调门高了起来。根据只言片语能听明白，他们谈的是赫鲁晓夫被免职以及以后的情况。

“我跟你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糟糕的、该受诅咒的 10 年，”将军几乎是喊叫着说。“你也赶快把它忘了吧，不然你得请求宽恕，可没人相信你！”

主人对客人进行反驳，客人生气了，扣起制服上的钮扣来，拽拽演员的肩膀说：“走吧！这也算是叫我愉快的伙伴……”

看起来演员是在打瞌睡。他用那双纤细的手遮住眼睛，但是我看见他颧骨部分的皮肉绷得很紧而且不停地抖动。我了解他，他脾气暴躁，不顾情面。我们在艺术剧院的艺专一起学习过，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大发雷霆，那样一来什么事都会发生。

让我惊奇的是，他站起来后，非常平静、非常有礼貌，而且是“循规蹈矩”地说：“我却认为这 10 年是伟大的。将军，我与您有不同的评价。每个人都有权持有自己的观点，

①尼亚加拉瀑布在加拿大与美国交界的尼亚加拉界河的中游。

而您不知为什么连我们的主人坚持自己的观点都不许可……”

我们生活中几乎从不被提及的这 10 年——1954 年至 1964 年——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巨大国家 10 年的劳动和生活如何？在亿万次各种冲突和各种情况下千百万人的命运怎样？为什么有人要极其顽固地将其从我们记忆中抹掉，就好像这些年有某种罪过似的？难道是随随便便的，只根据一两个哪怕是具有通天本事的人的意志，就从书本和电影中把姓名和事实、数字和对比砍掉了吗？

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不仅闭口不提，而且我可以说这样做是怀有恶意的。天真的人们认为，这是基于对赫鲁晓夫的党务和国务活动的否定。但是主要原因不在这里。他敢于触动的那个行政官僚体制，对他是“一点也不饶恕”的。这是那个体制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炫耀威力”，以儆效尤：“不要触动我们！”

任何最完备的计算机对那不十分平静又不十分简单的年代也做不出无可争议的评价。企图用红色或是黑色不仅改写我们那 10 年，而且改写整个 70 年历史的奢望本身就是荒谬的。

进行理智思考的时刻终于会到来的，如果不再去满足所有思维健全的人要求还人民以历史本来面目的愿望便成了一种罪过。这种情况是必定会出现的。这要靠许多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在这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进行客观分析，将会给“赫鲁晓夫的 10 年”找到一席之地。

忘却过去是危险的。我们懂得，“忘却”和“停滞”是同

范畴里的词汇，打破这些词的内涵是可能而且是必须的。这种事没有沸腾的热情，没有损失和痛苦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必定会有所收益。我们今天，就象党的 20 大之后那久远的年代一样，欢乐和焦虑是并存的。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与那次党代会的决议休戚相关，大多数朋友没改变观点。其中有娜捷拉·格奥尔基耶芙娜·洛尔德基帕尼泽和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萨仁。我知道，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即那位从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把“上门作客”的将军带到娜捷拉和维克多家来的演员，是忠于自己的青年时代的。

我们的朋友仍然住在伏龙芝滨河街上。他们的女儿娜达莎已长大成人，出嫁了。我们自己的 3 个儿子也长成了大人。在那个元旦的夜晚，他们安详地睡着，不知道大人之间发生过的争论。他们常常问，国家很久以前和不久前都发生过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回忆经历过的一切，我并不为自己没做详细的记载和写日记而自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含有耸人听闻的内幕详情的回忆录。这是一个记者的笔记；他开始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后来到了《消息报》，正赶上那些长期不准写它的年代。

我的“日记”就是记忆和报刊杂志的合订本。那就是我的观点和兴趣的范围。要说我定能避免做出主观评价，未免天真，但我努力从事实出发。

“事实应当渗透到记者骨肉中去，就象矿工身上的煤尘

一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①教导《共青团报》的年轻记者们说。他又说：“第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时，交给我一个任务，写写列宁格勒一名工人代表候选人。我来到彼得堡，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的谈话。几次在他家赶上喝茶，认识了他的一家人。等《共青团真理报》登出了这篇特写，我寄了一份给他，上面还有我赠送他的题词。我收到的回信是：‘您写的都对，记者同志，就是不该让我照着镜子梳头，难道您没发现我秃顶吗？’朋友们”——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叹地说，“——切莫把梳子变成我们职业的战地工事用具！”

我认为遵守另一条原则也很重要。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观念的尺度去衡量过去。忘记事件发生在彼时彼地，而不是此时此地，想入非非地感叹“唉，假如……”是最徒劳无益的。一旦我们之中许多人感觉到 20 大的爆发力在减弱，原地踏步很快就会导致后退，便可以琢磨出其中的缘由。可以看出，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对我们自己，即那些坚定地捍卫 20 大所开创的事业的人，是进行指责呢，还是老实地承认我们没有力量坚持住自己的观点？把某些东西归咎于可恶的调和习惯和安逸的生活吗？也许把一切都记到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帐上？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而且很方便，就象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意味深长地耸耸肩一样。

我们撇开这些办法吧。现在，当公开性原则不仅使作用

^①波列伏依（1908—1981）著名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真正的人》，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等。

和责任迅速提高，而且使言论更加自由的时候，在任何时代都没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是能最容易和最迅速地为真理而欢呼的。

我对我的儿子们说：是的，我们是有过错的，因为我们离群索居，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克制没有象狡猾地勾结在一起的官僚阶层那样去行动。我常让他们记住一句名言：“不要责备没来得及或未能做成某事的人，不要妨碍正在完成某事的人，主要的是要抓紧去做完你该做的事。”

1987年春天，在庆祝《消息报》创刊70周年的那天，我应邀出席庆祝大会，而且还是主席团成员。间隔了20年之后，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件大喜事。那天晚上我又见到了我的同事们。发行量很大的《消息报》上刊登了从前的工作人员的短文，其中也有我的。我写的是：

“报纸的读者明天要知道的，编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地超前，所以消耗起来比所希望的要快得多。在这个对《消息报》来说是喜庆的时刻，我思念那些已离开我们的人，思念那些无论按良心和事实都完全应该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人。我本想写出他们的名字，但写不下去了：名单会是沉重和冗长的。

“我没和亚历山大·鲍文^①一起在报社工作过，但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想在后备营里苟且偷安的人是体验不到职业记者的幸福的。我提起这一点是因为差不多30年前《消息报》所进行的第

①鲍文（1930—）苏联新闻工作者。1972年起任《消息报》政治评论员。1981年起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一次尝试完全不是徒劳的。也许有什么东西已使我们离开了原先的立场，但我们明白，假如站在党的原则的立场上，站在民主主义和公开性的立场上，假如我们不混淆职务和服务这两个概念，报纸的能量和我们职业的力量有多么大。

“怎能不羡慕今天在办《消息报》的那些人呢！有冲锋的经验，也有时间，时间是不能容许萎靡不振和拖延迟缓的！”

在政治中，社会生活的倒退有时是从细小的、不易觉察的事情上开始的。到后来，当什么都无法改变的时候，你才明白，这是长时间的衰退，按上帝给的期限说，个人的整整一生都未必有这个时间长。这种例子见于我们自己的历史。20大恢复了由于斯大林的专横而受害的千百万无辜的人的名誉和尊严，但对他们，对这些逝去的人说来已经无所谓了，正如我们是否修建已经许诺的纪念碑对他们是无所谓的一样。须知我们也需要纪念碑，为实现我们的意愿，坚定我们的理想。“逆向”修建纪念碑是危险的，那很容易从台座上跌落下来。

在那个《消息报》周年晚会上，一位熟识的文学家说：“我们还幸运。我们是20大后开始的，我希望27大之后能做点什么。”

我俩都知道，一切都没那么简单。要知道，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抱怨说：可惜，“赫鲁晓夫这一代”还没完全死光。他们一直幻想着“铁腕”，“强权”，认为那是解救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有什么，这并不新鲜。托洛茨基分子也曾断言，没有什么比民主制更反动的。那位“上门做客”的将军大约是由于考虑不周，也说了类似的话。

麦洛尔·斯图鲁阿也在《消息报》纪念 70 周年的报上发表文章。1959 年他是属于那种很活跃，人们常说的那种“点子最多”的记者。我俩，主编和文学编辑，一起毫不客气地跑到印刷厂的拼版台去更换陈旧的、人们看厌了的标题。尽一切可能，冲破单调乏味、枯燥无聊的束缚，引起读者的兴趣。

有一次，麦洛尔受编辑部紧急委托到叶里谢耶夫商店买了 4 公斤黑鱼子酱，星夜送到舍列墨吉耶渥，请求“英国航空公司”的英国飞行员带往伦敦。这正是查理·卓别林在我打电话请他让我们首家刊登他的“自传”里的几章时，定下的稿酬。书马上就要发行了。《泰晤士报星期日版》准备一周后登载这本书的片断。

他解释说，书问世时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鱼子酱正好用得着。

“发疯了，”当我们驻英的记者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将一个大大包——《消息报》社食堂的一只大锅，里面装满从卖冰激凌女人那讨来的冰和 4 公斤鱼子酱——送到卓别林府邸时，他说，“这些年轻人将了我的军”。于是就把手稿交出来。

查理·卓别林言而有信。

我们的记者拿到稿子，坐在电话机前，即刻翻译起来，把书中最精彩的一段，足有一版篇幅口述给速记员。当天我们便登了出来。读者喜欢这不同寻常的材料，中缝里讲了材料的来源，我们也很高兴。对西方报纸，尤其是对《泰晤士报星期日版》来说是“扎了一笔”。因为这家报纸的主编不久前刚来过《消息报》社，他曾不无自负地企图指教我们要变

得精明干练和随机应变。

这位地位显赫的编辑看到载有卓别林的书的片断的《消息报》时，很有气度地打电话给我们编辑部，请求允许派他的一名编辑来莫斯科见习。

顺便说说，我们的会计也很高兴。刊载此文没花一点外汇。当时，1966年，鱼子酱是22卢布1公斤。这是我们这里的价格。我们不知道在英国是多少钱，总要贵一些吧。

这一小段插曲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要引麦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在《消息报》上所写的话。

“想起了一次编辑部的不眠之夜。这是60年代初的事。在讨论工作计划的短会上，主编谈了谈他的心事。

“‘20大以后报纸前进了一步，’他说，‘但时间在前进，可我们却常常搞无效劳动，在原地踏步。明日出报后咱们集合起来，讨论讨论这第二步的问题。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限制时间。如果需要，就开个通宵。索尼娅会给我们弄点夹肉面包和茶的。’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走第二步。速记员来不及记下那些新的想法，栏目，细则等等。时间不停地过去。白天变成了傍晚，傍晚又变成黑夜。窗外已开始破晓。突然间一种无形的忧虑感染了我们大家：我们觉察到，所有我们那些看起来很有启发的建议与第二步毫无共同之处，实质上仍属于原地跑步一类修饰性措施。忧虑开始变成种痛苦。我忍不住，就发了言。

“‘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我说，‘我们的不眠之夜毫无意义。只要党不走第二步，报纸是不可能走出第二步的。’

“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主编。大家

都料想，炸雷马上就会击中这个亵渎神明的人。但任何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

“‘我们散了吧，麦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是对的。’阿朱别依轻声又疲倦地说……”

1964年10月里，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时我和妻子商定，不徒劳无益地去谈论谁是谁非，不让那些委屈和荒谬的事情往心里去。我清楚地记得，在拉达^①的父亲刚被免职的一天里，她说：“你知道，这当然是痛苦和不公道的，但是，也许这样更好。”

这个“更好”包含着一种希望，希望生活——指广义上的社会生活——能重新获得失去的活力和合理性。不只我们，许多人都希望，“第二步”的时刻到来。

如今，已过去了几乎1/4个世纪。回头看看经历过的一切自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对无知匆匆作出评判是不好的。这就是我决定讲讲我自己和我的亲人所了解的情况的原因。那10年本身当然是有其以前的发展经过的。

1949年快结束了。再过两个来月，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专业3年级的学生进行完例行考试，就该到报社去实习了。我和拉达在她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住宅里做迎考准备，当时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

莫斯科的老住户都知道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苏维埃V形楼，以前那是舍列梅捷夫伯爵家族^②的官邸，是由建筑

①拉达是赫鲁晓夫的女儿，阿朱别依的妻子。

②舍列梅捷夫家族是15—20世纪时俄国贵族。10世纪封为伯爵。

学家亚历山大·梅斯涅按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的口味设计的。粗笨的“П”形楼房加上进口处的小花园完全适合于它的用途：革命前都是富有的特权阶层的人到这里来租用房子。

在 20 到 30 年代，这里住的是政府要员、军队和党的著名活动家。1938 年赫鲁晓夫也在这里得到一套房子，他从“滨河街公寓”搬到这里。同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来莫斯科出差时——不论是从基辅来，还是战争时从前线来——，就住在这里。房子半空着，陈设是那些年那种禁欲式的——没有地毯、玻璃柜、水晶玻璃吊灯，也没有名画和木刻。台灯都是花岗石底座，上面罩着尖顶的毛玻璃灯罩，还有仿铜镶边，那样子就象大蘑菇似的。

家具笨重而单调——床、桌子、椅子，有亚麻套子的长沙发、书橱、柜子。大概这幢楼的其它房子里也是这样，因为对此有个不成文的标准。那时候上层人物还没醉心于“室内装饰”，而且这种事也不风行。

后来我才明白了当时那种格调的来源。斯大林就是在这种“官房”里按严格的规矩生活。在南方，在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他的住宅和别墅都是这个样子。地板、天花板和墙壁都是木制的。最低限度的家具，没有任何装饰画。家具全是在一个工厂按同一种式样制做的。

住宅里的主人，起码是赫鲁晓夫家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这些家庭用具的拥有者。他们住的地方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们的。床单和毛巾上都印着“苏维埃 V 形楼”字样或其它机关的印记。桌子、椅子和沙发上都钉有金属的财产登记牌。偶而住宅里会有些凶神恶煞般的人来查对号码，好

象住户里的人会侵吞这些东西似的。

赫鲁晓夫的住宅尤其空荡。赫鲁晓夫一大家人常住在基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不常来莫斯科，他完全不注意家具和陈设。

那天夜晚我和妻子快读完笔记时，前厅里响起了说话声，有人走进了房里。原来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万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①以及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考涅楚克^②来了。拉达到厨房帮家庭女工做饭，很快大家就在桌旁坐下准备就餐。打断长辈的谈话是不合适的，我们只是从谈话中得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刚才到斯大林那儿去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从旅馆里把因事来莫斯科的华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带来了。

看起来，那天晚上赫鲁晓夫是需要人陪他说说话的。他说要去基辅交代工作，因为他要被选为莫斯科州委书记——这个问题已经定了。

华西列夫斯卡娅哭了：“乌克兰离不了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句话使赫鲁晓夫很感动。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卡娅说的话是真诚的。这位波兰、苏联女作家是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战争年代她积极给报刊杂志撰稿，在前线多次见过赫鲁晓夫。华西列夫斯卡娅 1942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虹》获斯大林奖金，这本书被称为战斗的书。

华西列夫斯卡娅和考涅楚克都珍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考涅楚克是位著名剧作家，他著有《舰队的毁

①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波兰、苏联女作家。

②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华西列夫斯卡娅的丈夫。

灭》、《普拉东·克列契特》、《前线》，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有段时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坚决保护过这位由丹克维奇^①谱曲的歌剧《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剧本作者。这部歌剧揭开了1951年夏乌克兰文艺周之幕。《真理报》载文，对该剧文学历史方面的“民族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罪名是严重的。事后赫鲁晓夫说，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平息了斯大林的怒火。允许让作者自己对剧本进行必要修改。《波格丹·赫梅尔尼茨基》一剧没列入那些受到严厉批判的文学音乐作品之中，中央已针对这些作品作出了相应的严厉决议。

万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死于1964年7月，她不知道赫鲁晓夫被免职的事。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对此有何感想不得而知。反正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世时，尼娜·彼得罗芙娜^②没收到考涅楚克半个字的吊唁。

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就象伊利亚·爱伦堡^③写的那样，“电话突然不再响了……”。这样快的变化是因为健忘，还是因为缺乏教养？不论是健忘还是缺乏教养都是派生出来的，其根源要深刻得多，它渊源于人的异化和唯恐冒失。和人家一起吃喝、一起打猎、钓鱼，常去人家里作客，请人出主意，求人帮忙，可是到时候，就象完全不认识一样。整天吓得提心吊胆：可别有人想起来，你，老兄，也是他的朋友，你把自己看成他的战友，可别有人想到并责备你，别降

①丹克维奇（1905—）苏联作曲家，苏联人民艺术家。

②尼娜·彼得罗芙娜是赫鲁晓夫的夫人。

③爱伦堡（1891—1967）著名苏联俄罗斯作家，著有《暴风雨》等小说。

你的职，别剥夺你的什么……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但这样的人很多。

潮水开始渐渐地、不知不觉地退去了，原来浪花飞溅的地方，成了干滩……

斯大林突然决定让赫鲁晓夫到莫斯科的用意是什么？现在谁也无法得知，就象谁也无法得知这两人之间谈了些什么一样。

但是，这种“干部上的帅车易位”即便看起来象临时安排，实则有以下几步考虑。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待在乌克兰似乎更合理，那里的工作正迅速发展，共和国给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粮食，顿巴斯正在恢复，动力生产增长，破坏了的城市正在重建，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有威望。斯大林知道这一点，但仍然急速地把他召到莫斯科。这里已经撤掉了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的职务。有人说，波波夫贪权使斯大林不放心，好象波波夫的3个职务是他自行确定的。现在我认为，赫鲁晓夫明白当时的形势，因“列宁格勒事件”而增长的紧张气氛不能不使他感到不安。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和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受斯大林委派积极镇压列宁格勒的干部。

现在清楚了，这一“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是根据谁的旨意发生的。1987年列宁格勒的《对话》杂志的18和19期以及1988年的《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了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一封匿名信向中央报告了1948年12月举行的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党代会计票委员会主席的丑行：准确的计票结果被隐瞒。对党员们宣布的是市和州党组织的领导人一致被通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同意州委第一书记波

普科夫的有 4 票，巴达耶夫的有 2 票，卡普斯京的有 15 票，不同意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拉祖金的有 2 票。

不用说，此类欺骗行为是党内严重的犯罪。但是，据后来得知，斯大林的勃然大怒是出于其它原因。斯大林从来不喜欢这座城市。他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座城市里，保住了自认为是党的领袖的权力，他不是在这里受到奴颜卑膝的顶礼膜拜。他记得季诺维也夫那个反对派，记得基洛夫被暗杀……于是借口找到了。马林科夫和阿巴库莫夫采取的是万无一失的策略。他们猜到了斯大林的心思，而斯大林的心思与他们自己的目的不谋而合。

被选为党中央书记的库兹涅佐夫是列宁格勒人，围困时期的英雄，他过分迅速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可能危及警惕地注视着每个潜在对手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是也列宁格勒人。莫斯科的列宁格勒人岂不太多了？

镇压开始于 1949 年。1950 年 9 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审理了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拉祖金，控告他们犯有叛国罪、反革命破坏罪、参加反苏维埃集团罪，并判处他们以极刑。当时苏联已取消了死刑，但在侦察时又恢复了。

在法庭上，库兹涅佐夫和活着的人告别时说：“我曾经是并永远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论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历史会证明我们无罪。”在我们时代，这种不应出现的、惨痛的、充满信念的话产生得多么频繁。对那些为了自己的功名而阿谀奉承，给多疑又爱报复的领袖炮制“阴谋者”名单的人